

巫觋人文—— 沈从文与巫楚文化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周仁政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周仁政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ISBN 7—80665—667—7

I. 巫… II. 周… III. 沈从文(1902 ~ 1988)—

文学研究 IV.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8946 号

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

作 者: 周仁政

责任编辑: 马美著

封面设计: 周 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5616(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02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7—80665—667—7/G · 475

定价: 24.00 元

承印: 长沙天彩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 410200 电话: 0731—806221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 本书运用文学文化学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认为作为原始拜物教的巫楚文化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的自然生命形式及其情感本质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理念和文化观念，使其具有了自然拜物教的思想特色。这就是敬畏自然、崇尚情感，反对功利主义、追求纯正超越的现代审美理想主义文学观念和实践。绪论对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作历史性的事实分析，一至五章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神”、“人”、历史和人文、现代社会几个方面对其思想和创作的文化哲学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结论对沈从文创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作出基本总结。

● 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

凌宇著

● 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

谭桂林 龚敏律著

● 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宋剑华著

● 新文学的本原

吴康著

● 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

赵树勤著

●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

李运抟著

● 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

杨经建著

● 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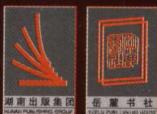
吴培显著

● 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

周仁政著

● 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岳凯华著



总 序

凌 宇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 80 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间，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 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

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

入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订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与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

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抟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序

凌 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内,开始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以来,沈从文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这表现为研究沈从文的学者日见其众,学术论文及专著的质与量日见其长,即便在校的本科及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的选题也占有着相当大的份额。沈从文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

然而,综观当下沈从文研究格局,基本上仍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90 年代以来,虽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填补、充实原有研究的不足或缺失,但作为阶段标志性的成果却不多。沈从文研究呼唤着新的突破。

这自有它的难度在。这是因为,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对研究者的知识准备与人生体验及研究方法的特别要求。根据我多年从事沈从文研究的经验,有三个难度。其一,沈从文及其创作中拥有的现代理性。现代理性及其建构,在沈从文那里,本来就是一种复杂的存在。他究竟是一个现代理性主义者,还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原本就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这些年来,在现代

文学研究领域，“现代性”这一概念，已被炒得炙手可热。在沈从文研究中，也出现了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两种不同声音。然而，对“现代性”这一概念定义的歧异，导致在一种定义下的现代性，在另一种定义中成了“反现代性”，反之亦然。这种争论，除了搞得人们头脑发昏，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并无多少裨益；其二，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维度上的问题与上一维度的问题紧密相关。沈从文是一个复古主义者的声音，自有沈从文研究以来，便始终不绝于耳。“桃源论”、“小农经济反映论”、“简陋的人性论”，便是在沈从文研究不同阶段的同一判断的变种。沈从文果真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吗？如是，他要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古？是以儒家居主流地位的封建文化之古，还是前封建文明之古？如果不是，他的创作中绵延不绝的牧歌情调又作何解释？其背后的追求又是什么？其三，沈从文及其创作与区域文化及其民族生存背景。巫鬼文化及其民族生存背景，在沈从文的思想及创作中，是一种显在。这涉及到巫鬼文化在湘西的独特承传。它不仅关涉到存在于中国特定区域并异质于中国都市与内地社会的文化统系，还关涉到一些特定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命运。沈从文在其创作中，不断摄取一种特异的文化及民族生存的外显影像，究竟是以一种异域情调来魅惑与迎合读者，还是内涵着源于他与之保有血缘联系的民族深心里的沉郁隐痛？如是后者，那么，又是否仅仅表现为一种南方少数民族历史命运的悲欢？其背后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人生与文化诉求？

上述三个维度中，理性（姑且不论是否现代的）建构的独特性，沈从文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方式，以及对一种特殊的文化承传及其民族生存方式的强烈关怀，合成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对研究者

的知识、理论素养与人生经历要求而言,前两个维度相对并不太难。只要是从整体而非局部、细读而非仅仅浏览、借重理性穿透而非仅凭印象、注重本源考察而非沉迷于概念游戏,对其所涉及的问题,不难获得清醒的认识。然而,第三个维度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显然具有较大难度。一是有关湘西巫鬼文化及湘西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相关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研究成果,虽然论著并不少见,具权威性的却不多,且大多缺少一种具世界眼光的宏大叙述与比较分析。因而,在这方面,可资借助的理论与史学资源并不十分充分。二是文化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其具体的人生情状与哀乐方式,不身临其境乃至置身其中(与其同呼吸、共命运),便难以从深处况味,并由兹升华为具博大悲悯情怀的理性认知。而这两方面的缺失,必然成为与沈从文对话的巨大障碍。

周仁政的这部《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是一部对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关系作系统梳理的学术著作。这部颇见功力的著作,概括说来,具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一、借助现有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与史学资源,对与沈从文及其创作具有血缘联系的巫楚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考察,显示出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二、以探寻沈从文思想及创作意象生成的巫楚文化之源为纲,以自然、神、人、历史与人文、现代社会诸范畴为目,演绎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及其创作内在的源、流关系,可谓纲举目张。其概括准确到位,考证缜密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三、自然、神、人、历史、人文诸范畴,在沈从文思想及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如在沈从文的观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是风景,自然才是一切;沈从文承传的巫楚文化传统中所高扬的自然神话精神,区别于史学神话;沈从文有关文学命题中的逆

向思维等等,对深入研究沈从文,提供着一些新的启示。

本书也留下了一些令人感到意犹未尽的问题。其一便是如前所述，任一文化都是特定的民族形式或人类群体的生存方式，它与特定民族或人类群体的具体人生情状、哀乐方式、历史命运血肉一体。因而，在考察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关系时，离不开对巫楚文化民族生存与历史命运背景的考察。而在这方面，在本书中表现出一定的缺失；其次，在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构成中，自然一生命，是两个具核心地位的范畴或意象。虽然本书作者也意识到其重要性，将其作为第一章予以阐释。然而，对其在沈从文思想与创作中的核心地位，还值得作进一步强调。

以上所述，不过是我浏览本书后得到的一种粗略印象。这一印象对与错，最终只能留待读者去裁判。

2005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绪 论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1
巫楚文化的神话体系与自然拜物教 /1
巫楚文化与湘西社会 /33
沈从文小说对巫楚文化神话体系的重建 /63
第一章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 /99
自然与“风景” /99
自然与生命 /124
自然与情感 /143
第二章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神” /173
“神”与信仰 /173
“神”与历史 /189
“神”与文学 /207

第三章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人”	/220
“人”与生活	/220
“人”与生命	/239
“人”与历史和文学	/279
第四章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历史和人文	/292
存在：空间与时间	/292
历史：“常”与“变”	/315
文化：“具体”和“抽象”	/337
第五章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现代社会	/350
发展：生存和斗争	/350
政治：革命和改良	/364
文学：“文运”与作家	/378
结 论 巫楚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学贡献	/397
参考文献	/405
后 记	/409

绪论 巫楚文化与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巫楚文化的神话体系与 自然拜物教

一、有关方法的解释：文化观念的 辨析与文学文化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受人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大致都在政治道德方面，即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教文化体系占据统治地位——“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确立和三纲五常的等级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文化的状况。中国文化作为一种长期的历史存在其实远较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历史丰富。其中从远古到先秦的史前文化状况和前封建文化景观作为

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的忽略，以至沦为一个未知的领域，除了其历史遗存中由于缺乏文字记载的薄弱和荒疏，多少也反映出历来人们关注文化的政治走向远甚于它自身的状况。其实，政治（或政教文化）历来都只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或一个特点的侧面，即那些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体制或制度层面的东西。另外，在信仰和习俗方面，即文化在其与人类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流程相关联的自然进程中的状况常常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因而，把文化作为“历史”来研究还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特殊生命体来对待，曾引发了一场 20 世纪的史学革命。德国著名的文化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理直气壮地宣称：“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①除了文化，人类社会没有历史。他说：

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的历史，那是只有在无量繁富的事实跟前紧闭双眼才能保持的。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38 页。

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①

可见，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有机性。不是历史（事件）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决定历史（事件）。历史的价值寓于文化的价值之中。因此，在斯宾格勒看来，由于历史乃是文化的现实，任何历史都只能是文化的一个阶段或一种表象，即文化生命体的某个特殊的过程，所以，关注文化就是关注人类生命体的流程（以不同的民族为单元）。与其关注没有生命力的“历史”，不如关注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就文化史而言，政教文化的成熟性在于它作为历史事件的明晰性，但这显然在于它作为“历史”的特殊性。所以，历史上对于政教文化的研究（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和文学史研究），都毫不例外地从属于“历史”研究。政教文化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文化的性质和历史的面貌。就文学而言，“发乎情”即得“止乎礼义”，“文以载道”就是“代圣贤立言”。文化不是生命的整体而是被分解的“历史”。历史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不是延续的，而是停滞的或断裂的；因而也不是有机的（情感化的或有生命力的），而是僵化的（政教—道德—理性的）。

所以，今天看来，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关注文化，主要的不是关注其政教性的方面，而是关注其作为生命体的流程，即其情感和生活。把文化史视为一部特定民族的人类生命史，本质上就是对于其作为特殊生命体的延

^① [德]奥斯卡·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